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1)02-0097-(06)

“莎菲”的背后:父之恋 ——关于中国“现代女性”精神建构的一种解析

王 进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本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分析了丁玲笔下的“莎菲”形象,并试图由此剖析中国“现代女性”的精神内涵,展示一代“觉醒”女性成长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 莎菲;现代女性;“恋父”情结;精神建构

丁玲的早期作品,以塑造了一组“莎菲”型女性(以下简称“莎菲”)形象而著称于史。“莎菲”那惊世骇俗的思想,孤独而又倔强的反抗姿态,不仅在当时像“一颗炸弹一样”,震惊了“死寂的文坛”;^①就是今天,透过70多年的尘雾去看,其形象仍然独特不凡。“她”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Modern Girl(现代女性)”^②的典型代表。然而,“父之恋”的出现,使“莎菲”形象所体现的“现代精神”,有了更复杂的表现。

“父之恋”产生于“莎菲”自己独特的“历史”。这历史的“起点”往往便是一位“送行”的父亲。就像阿毛(《阿毛姑娘》)的命运是以阿毛老爹送她出嫁开始一样。而梦珂(《梦珂》)、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伊萨(《自杀日记》)等的身后,也无不有这样一位身影孑然的父亲。虽然,父亲之于离家漂泊的女儿,不过是这样一个起点上的“瞬时”存在,但女儿对父亲深切眷恋,并在无“母”的伤感中,更添依父立命之感。这一份绵远的“父之恋”常常飘荡在“莎菲”的现实世界里。

频频出现的“父之恋”,一定是“莎菲”已深深沉淀的心理情结。不过,这个情结始终是隐秘的。它藏于“莎菲”背后,透出怀旧的温柔和伤感,与文学史上充满“狷傲”雄强之美的“莎菲”形象不相谐和。由此,“莎菲”正面体现的现代意识与其背后隐示的传统眷恋,便形成了一系列有意味的反差和对照:独立/依恋,孤独/同盟,自由/束缚……

那么,“父之恋”情结是如何参与“莎菲”的精神建构的?在这条起于“父亲送行”的路上,“莎菲”是否真正完成了一个现代女性主体的建立?

本文试图以“父之恋”情结为透视点,从一个侧面来探寻中国“现代女性”的精神建构。

20世纪20年代的新兴城市,是乡土中国代表着现代文明,意味着实现“自由”、“民主”、“进步”

收稿日期:2001-01-02

作者简介:王 进,女,湖南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

等“五四”理想的光明之地。然而,从乡村漂流而来的“莎菲”,失望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题名《在黑暗中》。黑暗,正是“莎菲”对都市的痛切之感。“她”在各个城市游荡,用异常犀利而挑剔的眼光审视一切。跟着上海的梦珂从学校、上流人家到影棚,“她”看到了一个“纯肉感的社会”;随着北京的莎菲不停地搬迁居所,“她”感受了那无从逃遁,充满爱之虚伪和“生之无趣”的沉闷、无聊气氛。即使顺着杭州近郊的阿毛那并不宽广的视角,“她”也能瞥见城市文明“神话”的虚妄……她见识了庸俗市侩的男性,堕入俗流的女伴;痛感追求自由的女子的绝无出路,似乎不是随波逐流就是沉沦堕落……对“莎菲”来说,城市,是处处散发毒素,让人无以生存的地方;恰如被感染“肺病”的莎菲,即使一再搬迁,最终也只能彻底离开城市,到那“无人认识的地方”,“悄悄”地生存和死去。身处这浓重的黑暗,“莎菲”不得不在抗拒“沉沦”中发出了“叛逆的绝叫”。^⑤终于,一缕希望的阳光,从这都市天空的黑暗中透露出来。它来自那遥远故乡的“父亲”。虽然,“他”从未作为作品中正面的人物形象出现,但却以不同形式闪现于每一个“莎菲”的现实世界,内在连贯地形成了一个可感可触的清晰身影。作为“力”者,“他”是这样充满了民间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元气。梦珂的父亲是个老来才回头的“浪子”,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镇静而豁达地领受着人生。阿毛老爹则有着少见的通达、乐观和牺牲情怀。在送独女远嫁时,面对即将来临的老年孤独,他对着“不忍离开”自己而哭泣的阿毛说:“嘿,傻子!有什么哭的?终久都得嫁人的,难道就真的挨着我一辈子吗?”把生离之痛隐于洒脱大方的人生态度中。而作为“爱”者,这位“乡土父亲”又是那么平易、宽厚和仁慈。梦珂小时,父亲会和她一起喝酒;在雨天,当梦珂“不必上学去”时,他会“像小孩般的高兴,带着女儿跑到花厅上”去听雨、下棋,并“常常为一颗子两人争得都红起脸来”。当梦珂长大离家,老年的父亲不仅对她提供经济支持,还有一份精神理解。即使女儿的婚事,也最后表示:“这是要由你自己的”。而在阿毛垂死之际,爬山涉水赶来的阿毛老爹悲恸至深:“……现在让我来接你……同爸爸回去呵。”他多想让心爱的女儿回到自己身边重新活过来!

这充满人性光辉的“父亲”,迥异于“五四”文学中精神逼仄、阴冷、专制的封建之“父”。虽然,“他”只是一个匆匆掠过的身影,但因这身影是“莎菲”黑暗世界的唯一亮点,便无形中照出那周遭的齷齪,尤其是都市男性的庸俗和市侩气来。在这作为“力”者和“爱”者的“乡土父亲”映衬下,后者显得格外的苍白、软弱和卑劣、丑陋。阿毛“所羡慕的那高大男人”,来自都市的“国立艺术院的教授”,给黑暗中的她点亮星火,却又无奈而轻巧地掐灭它,“最后只是投给她一个抱歉的眼光”;显出这“高大男人”内里的“无力”。而小章的“空虚”、“苍白”使得伊萨连引起“有捉弄他的冲动也没有”。还有苇弟的软弱,凌吉士(《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卑劣”。更有晓淞、澹明引诱、玩弄表妹梦珂感情的“丑恶”和“冷酷”……这都市男性的“弱”和“丑”,使得妓女阿英(《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也不自觉地用远在故乡的情人陈老三的“粗壮”,比出那“穿衣服的后生”嫖客的“尖”、“瘦”、“薄”来。

这来自乡土的“父亲”,不仅成为都市男性的批判尺度,也为“莎菲”提供了一份反抗都市黑暗的野性力量。梦珂继承了父亲那来自民间活泼、强健的生命力。“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她少时便会“像父亲当年一样地狂放地笑”,懂得“怎样地去煽动那美丽的眼”。正是这一份来自乡野的“力”,使得后来深陷“纯肉感的社会里”的梦珂,在屈辱地经受了少年导演对她的“商品化”审视之后,仍能傲然的神采“走进办公室”,并“安闲的,高贵的,走过去握那少年导演的手,用那神采飞扬的眼光照顾一下全室的人”。这种姿态傲慢、自尊、挑衅,正是莎菲“我不过是个女人味十足的女人”那愤世嫉俗心态的力量外现。阿毛那“山里人”的倔强更是令人惊心动魄。与阿婆、丈夫及周围一切人越来越深的隔膜,以及对命运的不可挣脱之感,犹如浓重的黑暗弥散在她的四周。为了追寻“那欢喜自己的男人”,她在“天还没亮”的昏暗中,固执地一级一级跑上山去,并在空无一人的高处放声痛哭。那种决绝的姿态,犹如屈原《九歌》中那感天动地的“山鬼”!这样的“倔强”一直把阿毛平静地送到生命的尽头。她那无与言说的巨大孤独和面对孤独的从容、超拔,显示的正是那种生自遥远的“父性乡土”的生命野性。阿毛之死恰是莎菲“悄悄的活下来,悄悄地死去”那绝望却不妥协

的誓言的承兑。

正因为“父亲”既是“莎菲”反抗黑暗的“同盟”，又是这“反抗”的力量之源，几乎关联了“她”最主要的生存需要，“父亲”，也就必然成为“她”永远的眷恋。对于孤独寄居都市的莎菲，回忆“故乡”，就是想起“父亲”。她甚至渴望他陪伴在自己的病床边，并“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对于精神崩溃，濒于自杀的伊萨，人世的留恋只有“父亲”。《暑假中》的嘉瑛，则还渴望故乡“有个哥哥（“父”之代名）”，带来一群“少年”，“在太阳光下，月亮下，星星下大家围着坐起来，听风吹落叶，听溪沟的潺潺流水……”；似乎“父亲”还意味着爱情和安宁……

二

“五四”“弑父时代”刚刚过去，子君那“女儿”对抗“父亲”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仍然激动人心，丁玲就悄悄地重塑了“父亲”的形象，达成了父女的和解，并使“父亲”成为“女儿”生存、抗争的同盟和力量所在。事实上，在丁玲笔下，正是这充满“力”和“爱”的“父亲”，才孕育、促成了这“女儿”——“现代女性”“莎菲”的诞生。无独有偶，同时代的梅行素（茅盾：《虹》）——“新女性”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④——也有这样一个“起点”上的父亲。尽管梅父较为冷峻，曾不顾女儿意志把她许配给人，但当女儿决意反抗丈夫时，他坚定地与女儿“同盟”，甚至“掩护”出逃夫家的她在自己家中长期避居，显示出“父亲”作为男性的通达和力量。作者描述这位父亲的笔调也是相当愉快而幽默的，并无“五四”文学对待封建之“父”的谴责态度。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时梅行素的处境与莎菲极其相似：在“市侩”却又有“诱惑力”的丈夫柳遇春（对应“凌吉士”）与软弱而多情的情人韦玉（对应“苇弟”）之间，犹疑、困惑、痛苦、挣扎并最终“出逃”。

当“五四”的“逆女”们与“父亲”在背后悄悄握手时，当年的“逆子”们却正对“他”进行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正面的、彻底的清算。高老太爷与觉慧（巴金：《家》）之间绝无调和可能的父子对抗，不仅激动了当时的热血青年，还在其后得到了历史的认可，使得这种“家”中的“父亲”形象一直在周朴园（曹禺：《雷雨》）、蒋捷三（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等人物身上延续下去。

看来，是“女儿”发现了具有人性光辉的、并与己有着血缘和“历史”关联的“父亲”的。尽管这个“父亲”的形象从未占据过历史的主要画面，仅仅是在“大革命后”一瞬即逝，并且只是因“莎菲”的一段怀想，甚或一个闪念，以梅行素追求“个性解放”长路中的第一个“驿站”而“微小”地存在，但毕竟给现代文学史上单一的“父亲”形象抹上了另一笔色彩。这个形象，因为与“主流”的差异而显得格外独特。而其“创造者”，也因此显出特别的敏锐和胆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27年的丁玲，从《梦珂》开始，第一个重塑作为“力”者、“爱”者的“父亲”形象，就显得非同凡响。

丁玲的早期作品，是“从来不给男性形象以任何光彩”的，^⑤但却唯独赋予“父亲”以“力”和“爱”的人性光辉。那么，对此时的作者丁玲来说，为什么是她那幼年即丧的“浪子”父亲，而不是二十年相依为命的“革命”母亲进入她这些“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⑥的艺术视野？一定是她发现了“父亲”能够提供“母亲”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他”首先提供的是“女性”所缺乏的“力”。

力——这是经过“五四”洗礼的知识女性，在大革命失败后，于幻灭中寻求自救所最迫切需要的。当“个性解放”等口号的思想之“力”早已在子君的死亡中衰弱，曾为盟友的“逆子”们的现实之“力”也已消失，而一直作为几千年的受难者、弱者形象代表的“母亲”也无“力”提供保护和支持时，^⑦“逆女”们只能从“父亲”处获取“力”了。这似乎是急切自救于“黑暗”中的唯一，也是最方便快捷的选择。

显然，丁玲首先是从自己父亲的“传说”^⑧中获取“父亲/力”这样一种对应性概念的。但问题不在于丁玲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小说中“父亲”形象的塑造，而在于这个形象一旦置于文本，置于“莎菲”的现实世界时，所生发的另一番意味。当“她”把“他”作为自己唯一的“同

盟”,力量的源泉来反抗黑暗时,“父之恋”已经参与了尚在“萌芽期”的“现代(新)女性”的精神建构。

更重要的问题是,“选择”父亲这一行为绝不是丁玲个人的。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父亲/力”这一对应性概念,更多地来自传统的文化心理、现实的社会(家庭)结构模式:“父亲(男性、阳刚)/母亲(女性、阴柔)”。所以,当“现代(新)女性”需要“力”时,丁玲和茅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暗合着普遍审美心理的模式。否则,人们怎能想象,“莎菲”那“放浪子的血液”是来自“母亲”?而那位具有“坚毅的品性”,“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的“女强人”梅行素,竟然是在“母亲”的教养中成长的?那样的“母亲(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只能是“巫婆”、“女妖”,她们的存在往往是“空穴来风”,没有“历史”的,并且只能使人产生一种“怪异”的丑感。

在这里,作家们为“现代(新)女性”的存在找到了“历史”根据和现实支持。“她”,必然是在有“父(男性)”无“母(女性)”的、单一的“他”性空间中,沐“阳刚”之光成长起来的;否则,怎能以“合法”身份走向这“空间”以外的世界并经受风吹雨打?但这种“恋父/弑母”的极端方式,本质上反映的却是几千年沉淀在人们心理中的“男性(强、主)/女性(弱、奴)”的两性关系模式。这必然影响到成长于其下的“现代(新)女性”的爱情意识。对经“五四”洗礼的一代女性来说,理想的现代爱情,是最直接地包含着“自由”、“平等”、“解放”等“进步”理念的,是确立自我主体意识,真正成为“现代女性”的重要标志;它必然成为自己“首要”的追求。但“五四”落后后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她们的理想破灭了。怎么办?如果说,沉君在《隔绝》中所讴歌的“五四”式“爱情同盟”此时早已成为破碎的梦幻,那么,只有从这梦幻中走出来,重新认知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理性审视他人和自我,才有可能重建和谐的两性关系。然而,“现代(新)女性”作出的却是另一种选择——依照“旧”的“强/弱”、“主/奴”模式来同构自己与异性的关系:“征服/被征服”;较之原来,只不过是“男女彼此交换了位置”^⑥而已。于是,才有了“莎菲”那种“执拗的女性优越心理”^⑦和梅行素们“雄强”的外表。这使得文学史上的“现代女性”和“新女性”形象首先便是以爱情上的“大胆”而“夺人耳目”,而其“现代”内涵却易被遮蔽。那种方式当然不是“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的正途。她们都落入了自己最要反对的两性关系的旧有模式中。在这个意义上,极度的“父之恋”情结扭曲和限制了“现代(新)女性”的精神发展。当“她”高扬、伸张自己的主体意识时,却忽视了也是作为主体的“他”的意志。这就背离了真正的现代意识。

如果把这种套用旧有模式的思维方式归咎于历史的“局限”,承认它也具有某种“革命”的意义,那么,可以相信,随着“阅历”的增长,“现代(新)女性”在爱情意识方面有着较大的超越的可能性。但是,对“莎菲”来说,“父之恋”情结之于“她”的影响远不止于带来爱情意识的“偏激”,而是深刻波及到“她”的整个生存意识。因为,“父之恋”暴露了“女性”最根本的弱点——脆弱。它可能降低“莎菲”认识自我、女性存在处境的清醒度,并消解将自我反思、自我审视的理性精神一贯到底的勇气,从而使其精神成长可能开辟的空间受到限定。这一点,才是“父之恋”情结对“现代女性”的精神成长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所在。但也正是这一点所表现出来的“生存自觉意识”,使作为“现代女性”的“莎菲”与作为“新女性”的梅行素们有了精神上的分水岭。

三

“父之恋”暴露的“脆弱”,来自这一代觉醒女性的根本处境——孤独。这孤独,首先是现实生存意义上的。对此,“莎菲”早已透彻而清醒地咀嚼过了。“她”似乎故意要在极境中检验自己,在生命、爱情、死亡的每个方向都逼近其纵深的最黑暗处,看自身是否有足够的理性力量去超越这份孤独。而那声震撼了一个时代的文坛,“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⑧的“绝叫”,从反面传达了“她”对这场“探险”中的自己的“骄傲”。在“爱情探险”中,“她”到达了尚无人企及的“性爱”极地,并在“两性战争”中孤姿高昂,无与伦比。而在“生命探险”中,“她”不止一次地直抵“死亡”,并以孤傲而决绝的姿态在这极地中徘徊。文学史上的“新女性”群中,还没有一个人敢于

像“莎菲”那样高蹈在悬崖的边缘，并在“女性自我”和“自我”精神上达到这种高度。但当“莎菲”面对女性自身的“历史”——“无历史”时，深刻的“父之恋”便暴露了“她”作为“女性”根源处的脆弱。当从现实生存四顾无人的大孤独中，本能地回过头从“历史”尽头去追寻最后的依托时，“她”只能看到一个影像式的“父亲”。“她”别无选择地眷恋着“他”。因为，在“她”的现实生存中，后者不仅能提供“力”，使“她”每一次上“路”都从“他”那里得到原发性精神支持；还能提供第二种东西：彻底的、纯粹的“爱”——而且，这“爱”是“母爱”绝对无法替代的。

在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的“第一人”^⑩的作家丁玲笔下，“父之恋”的出现，首先使“莎菲”“爱情探险”的“现代性”有了某种“非现代”的复杂内涵。在这场具“历史”意义的、与作为对等的“异性”的交锋中，“莎菲”似乎占了上风，并以有些夸张的姿态张扬了作为“女性自我”的主体。但“她”在“两性战争”中的“胜利”恰恰是以“父（男性）女（女性）同盟”为重要“武器”的。两相对照，后者“男女同盟”的存在便暗中消解着前者“两性战争”的意义，从而使“莎菲”的“胜利”多少显出了虚幻的景象。在这里，正是“父爱”所包含的血缘关系遮蔽了男（父亲）女（女儿）之间的两性差异，使作为“女儿”的“女性”在面对作为“父亲”的“男性”时，不需同时面对必然随对方“异性”而来的“威胁”。因此，在“两性战争”中，“女儿”的“同盟”非“父亲”莫属。更重要的是，由于两性的“性”差异消失，这里的“男女同盟”在作为衬托“两性战争”的唯一背景的情况下，可以轻易转换成“男女同性”，使得一种以抹平“性”鸿沟为代价的、“两性和谐”的关系图式得以可能诞生。这将不仅仅是违背了“莎菲”的初衷的问题。这样一种关于两性关系的乌托邦式的想象，与刚刚才被现实粉碎的沉君一代女性作家笔下那种绝对无“性”的“爱情同盟”，有何等的相似！历史的惰性是可怕的。若是沿着它下滑，这一代刚从“他们”中分离出来，在艰难、痛苦中才确立了作为“他者”的“自我”的“女性”，精神成长不仅会停滞，而且会倒退。但“莎菲”毕竟已是“莎菲”，终于是肯退回去。“她”深知“女性自我”对本身存在的致命重要性，所以才敢于在这样的极地去考验自己作为“女性”可以承受的“孤独”极限。不过，在这场极地的“两性战争”中，“父之恋”终于使“孤独”的“她”，轻易地依靠了作为“他者”的“父”的力量，从而丧失了“她”对自己扭曲的“女性自我”意识做最深刻的反省的可能。于是，“莎菲”的“性别”成长也就只能终止于此。也许，这就是“莎菲”的突出代表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性别的自觉的人物”^⑪——莎菲，在终于得到“好丰仪”的凌吉士的吻后，丝毫不敢再停留在那仍然“迷人”的怀抱中，而以对方“灵魂卑劣”的道德借口，倏然终止了这场旷世“性爱”的原因吧？她不是在这一吻之后“一脚将他踢开”，^⑫而是因为内心临近那几千年的禁地——“女性性爱”，感到了一种原始恐怖，自己首先落荒而逃！同样，“父之恋”情结，在“莎菲”的“生命探险”中，也必然制约其极地的“孤独”体验，限定其“自我”主体精神成长的高度。本来，在这场探险中，“她”至少在哲学意义上已将这份“孤独”逼近了“死亡线”，并试图在这“死亡”的体验中用“孤独”穿透“自我”。不是么？长卧病床的莎菲，在“肺病”的不断恶化中似乎更有一股孤绝的力量；独闭公寓的伊萨，则在不停地书写强烈的自杀冲动中反倒重新活下来。谁又能说默然自沉于永久黑暗的阿毛不曾比常人更深刻地生活过呢？所以阿毛之死才那么令人震撼！但是，当“她”终于到达“死亡”的边缘，“父之恋”带着“爱”的面目降临了，使“她”终于停住了沉重的脚步，究竟再不愿也不敢涉足那极地的孤独。阿毛临死前虽然拒绝了跟老父回家，但阿毛老爹赶到她病床边的这个深情场景，多少缓解了她那由巨大孤独所带来的生命痛楚，使她不致于绝对孤独地走向这生存的极点——死亡。伊萨到底从“死亡线”上撤回，也无不与日记中反复渲染的“超过一切父亲的爱”的“父爱”有关。毕竟，死亡“依其本质就是我自己的死亡”。^⑬对死亡之绝对孤独的清醒面对，是现代人的理性力量所能达到的极致。而在这里，“父之恋”虚伪地成为“莎菲”拒绝向“死亡”这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⑭探究的借口。尽管“她”常常被逼到死亡绝境，但那虚幻的“父之恋”往往“安慰”或“拯救”了“她”——就在每次“往下一跃”的那一瞬间。在“父之恋”那“爱”的笼罩下，“莎菲”丧失了逼视自己内心最痛处的勇气，遏止了“她”作为“现代人”的“自我”意识的伸张。

这一切,便是“莎菲”表现于“父之恋”的孤独和脆弱。

“父之恋”,才是“她”精神成长难以跨越的极地。

至此,“莎菲”精神世界结构中一组独特而有重要意义的对应关系出现了:“恋父——孤独/脆弱”。这是“她”的一个心灵密码。事实上,在丁玲早期作品中,“力者、爱者的父亲”总是与“孤独的女儿”同时出现的。女儿(女性)是那么孤独、脆弱,时时幻想有一个“父亲(男性)”可做依靠,并与她一道承载起她的爱与愤,生与死的重负。这其实是弱者的心态。到此为止,“莎菲”终于无法跨越自己内心的“父之恋”所设定的极地,没有成长为具有充分、健全的“女性自我”和“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她”仍然只是“父亲”的“女儿”,是“男性”属下的“女性”,尚处于走向主体人的圆满过程中的“萌芽期”。但是,较之“她”的“五四”甚至同期的“新女性”姐妹,“莎菲”所达到的“现代”精神的高度超越了她们所有的人。即使对自身的“父之恋”情结,“她”也有着深刻的感知。所以,“她”才将“父亲”绝对栏隔在自己的现实生存之外,使其对自己永远只是一个“影像”,一个难以告别的“历史起点”。因而,“莎菲”的“父之恋”也就永远只是止于“恋”。这就给“她”终将超越这个“父之恋”的极地带来了可能性。

不过,超越它,对刚诞生不久就陷入黑暗中的“现代女性”,是艰难的。“父之恋”,是此时所有的“女儿(女性)”无奈的文化和历史选择。正是在这里,显示了作为男性作家的茅盾和作为女性作家的丁玲的不同:梅行素在走出由“父亲”送行的第一个“驿站”的同时,也就走出了“父之恋”的玫瑰幻影。这显然带有明显的“欧化”想象。而女作家丁玲则更真实地展示了“莎菲”的历史和文化处境:刚刚“浮出历史地表”^⑦的女性们,何处为家?

注释:

- ① 毅真:《丁玲女士》,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② 方英:《丁玲论》,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③ 茅盾:《女作家丁玲》,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④⑤ 赵园:《艰难的选择》,第265页,第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⑥ 钱荫榆:《苍茫集·叛逆“闺秀”:丁玲与现代女性写作》,第10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⑦⑧ [日]中岛碧:《丁玲论》,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⑨ 以上参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第17至2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⑩ 参见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别集》第45-49页,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
- ⑪ 钱荫榆:《苍茫集·叛逆“闺秀”:丁玲与现代女性写作》,第10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⑫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⑬⑭⑮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第109页,第121页,第2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⑯⑰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88页,第288页,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BEHIND THE BACK OF “SHA FEI”: ELECTRA COMPLEX

WANG Jin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from a specific perspective “Sha Fei(莎菲)” described by Ding Ling and attempts to anatomize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within the “Modern Women” peculiar to China, fully displaying the arduous process of the growth of a generation of awakened women.

Key words: Sha Fei, modern women, electra complex, spiritual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吴晓明)